

我的外祖父俞平伯

他是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

他是“新红学派”的创建者之一。

他是著名昆曲研究家、昆曲活动家。

韦柰◆著

俞平伯



我的外祖父俞平伯

韦柰◆著

俞平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外祖父俞平伯/韦柰著. —北京:团结出版社,
2006.6

(目击历史系列)

ISBN 7 - 80214 - 131 - 1

I . 我... II . 韦... III . 俞平伯 (1900 ~ 1990) —
生平事迹 IV .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0333 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发行部)

(010) 65228880 65244790 (总编室)

(010) 65244792 65126372 (编辑部)

网址: <http://www.tipress.com>

Email: 123456@tipress.com (出版社) 65228880@tipress.com (投稿)

65133603@tipress.com (购书) 65244790@tipress.com (投诉)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大厂聚鑫印刷厂

装 订: 三河新兴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170 × 230 毫米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90 千字

印 数: 6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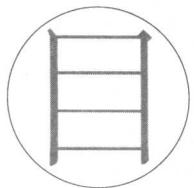
版 次: 2006 年 6 月 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6 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80214 - 131 - 1/K · 319

定 价: 25.00 元 (平)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小燕子的梦(代序) 1

楔 子 6

一、倦说《红楼》 12

 1 12

 2 19

 3 37

二、浩劫余生 46

 1 46

 2 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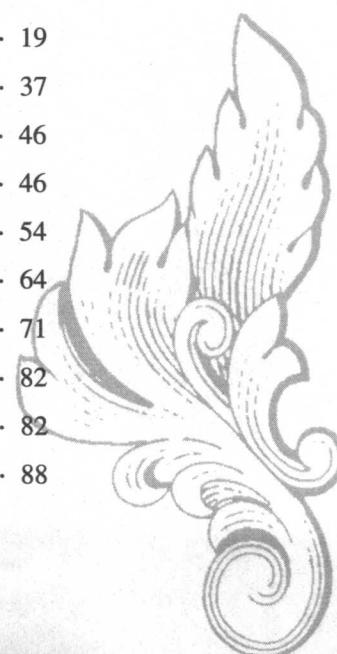
 3 64

 4 71

三、嬿婉同心 82

 1 82

 2 88





My Grandfather Yu Ping Bo

我的外祖父俞平伯

四、情深谊长	92
1	92
2	97
五、闲居杂记	109
六、旧醅新酿	114
终篇	120
附录	122
一、重圆花烛歌	122
二、《重圆花烛歌》跋	124
三、为叶圣陶作《兰陵王》提修改意见	132
四、“干校”日记	136
五、丙辰京师地震日记	144
六、序	155
七、随外祖父游香港七日琐记	158
八、旧纸上历久常新的幽默——俞平伯的打油诗	173
九、代拟吾庐约言草稿	175



小燕子的梦(代序)

彦 火

1990年巴黎时间10月16日凌晨5时，我在巴黎客寓睡梦中给电话响声惊醒。

拎起电话筒，传来家人感伤的声音：“俞平伯的外孙打来电话，让我通知你，俞平老逝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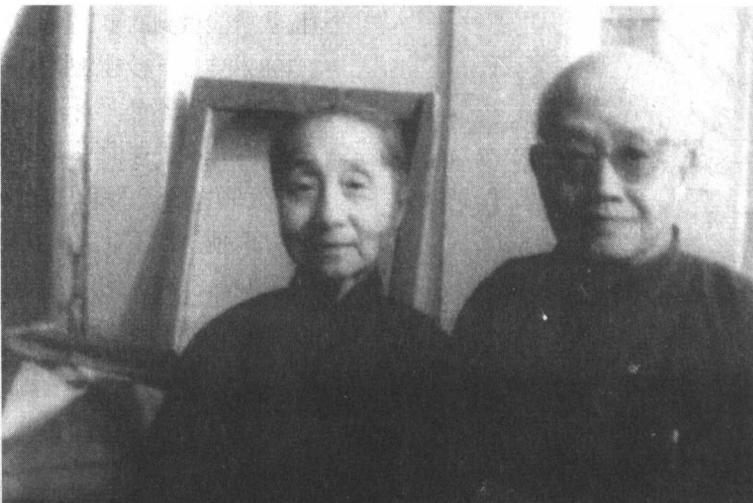
我握着电话筒，愣了好一阵子，才嘱内子代打电话给俞平老的家属致以慰问，并通知韦柰兄代送花圈。

虽说巴黎的时间比香港早了七个半小时，但，当内子再来电话时，说俞平老已立即火化了，我仅剩下聊以表达遥远的哀思的一点点虔诚竟已晚了！

那一天透早醒来，瘫在床上，俞平老的音容历历，拂之不去。

那年9月初去探望他，

俞平伯夫妇 1971 年自干校返京后在永安南里寓所阳台的合影。





My Grandfather Yu Ping Bo
我的外祖父俞平伯

我已有某种预兆，所以临离开北京那一天，又去看他一次，还料不到他走得那么快。

当时的他，迹近“植物人”，除了保姆一天两餐抱他起来喝稀烂的粥水，他一直躺在床上，浑然不觉。连他平素最疼爱的外孙韦柰，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的离去，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他来得孤寂，走得也孤寂，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

他逝世后立即火化，是他早年向家人所作的叮嘱。

一代红学大家、一代文学宗师，丢除了一切繁文缛节——不要说隆重的追悼会、告别仪式，连他的友人向他表达悼念也来不及。

他孑然地走了，伴着他走的还有那一身坚韧不拔的傲骨！

俞平老的外孙韦柰，4月下旬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说俞平老弟二次中风，已呈昏迷状态。又说他与母亲(俞平伯的女儿)苦劝俞平老人医院，老人家恁地不肯。

理由很简单，家里的条件再不好，还是自己的窝。

正如韦柰说：“他一生为人正直善良、性格豁达倔犟。”

这也许是俞平老“倔强”的一面。

二

1990年1月4日俞平老的90大寿，我曾在香港《明报》专栏写了一篇祝贺文章。

当时俞平老身体已很孱弱了。韦柰每次来信提及俞平老的健康，一次比一次担忧，我是一直捏着一把冷汗的。以后几个月，我所能做到的事，是设法给他捎去一点野山花旗参。

1989年5月下旬赴北京公干，特地跑去看望他，当时他已病卧床榻，举箸不灵。我怀着快快心情走出南沙沟俞寓。

过去，每次去探俞平老，都很开心。

快近90岁的老人家，每次听见我来，便颤巍巍地从房间走到客厅。他执拗不让家人扶持。在他纷沓的步履中，我感到那一份执着，从有点佝偻而矮小的躯体散发出来。

他喜欢抽烟，一支又一支地抽，每次探望他，我都给他带

上一条香烟。

五年前的一次会面,他见到我时显得特别高兴。他告诉我,前几天刚参加清华大学校庆,并在他的好友朱自清纪念碑前拍了照片。

说罢把惟一的照片和嘉宾襟条送给我,我把嘉宾条别在衣襟上。他天真地笑了。

三

我与俞平老的友谊,是从1978年开始。那时我对现代中国作家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俞平老也在被研究之列。

当年,香港的篆刻家许晴野为我介绍了俞平伯先生和叶圣陶先生。其间与俞老通了好多封信,每次到了北京,例必去拜访他。

俞平老是甘于寂寞的人。自从1953年受到点名批判后,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即使在1978年内地文艺政策开放后,许多老作家、老学者纷纷参加公开的文化、政治活动,而俞平老仍然是深居简出。

晚年的他致力于旧词的钻研,闲来与他的夫人许宝驯女士合作谱写了不少昆曲。

俞平老与年长他四岁的夫人是患难与共、恩爱很深的伴侣,1982年许夫人逝世,俞平老作悼亡诗《半帷呻吟》,情意款款。

自许夫人仙游后,俞平老即落落寡欢。某次去看望他,他倏地提起对20年代他到美国考察途经香港的事,对香港十分缅怀。

后来我尽力为之奔走,1986年11月俞平伯应香港三联书店与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邀请,发表对《红楼梦》研究的新见解,轰动一时。

1988年他的《俞平

与促成聚会的潘耀明(右)
在一起。





My Grandfather Yu Ping Bo
我的外祖父俞平伯

伯论红楼梦》出版,凡77万字,是学术界的大事。这本书我原拟代为在海外出版,可惜未能实现,乃一大憾事。

四

俞平老逝世后,在香港报章上看到一篇文章,谈到俞平伯和梁漱溟之不同,是他“直到死还都是‘文艺’的”,而梁漱溟则参过政。

诚然,俞平伯先生是典型的温文尔雅的书生,他是学者,也是文学家。

学者是倾向于理性、冷澈的,文学家则多是热情的拥抱。俞平老在五四时期,曾奋力呐喊过,大力倡导“平民诗”、“民众文学”。

也许这是他受到时代的感召。

但热情平伏后,他又埋首于学术研究——研究他的《红楼梦》和古典诗词。

这是他的本分,始终没有丢弃。

大抵这就是文章所指的“文艺的”俞平伯。

尽管俞平伯自五四新文学运动后,几乎没有涉足政治的圈子,但政治却偏偏找上他。

俞平伯是内地解放后三大政治案件(又称“文坛三公案”的主角之一(其余两个主角是写《武训传》的姚克、“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胡风)。

“三公”之一的俞平伯,相信直到逝世的一天,还不知他为什么会成为“反动学术权威”。

因为他不过是以一个学者求真求实的态度去研究中国的古典名著。

对他,这永远是解不开的谜。

五

“我们低首于没奈何的光景下,这便是没有奈何中底奈何。”

近来，整理俞平伯先生的赠书，发现一本他早年的诗集——《忆》，其中有以上的话语。

这本诗集写于1925年，中国内忧外患，文化人在“低首于没奈何的光景下”，去追忆过去的梦——特别是儿时的梦，无疑是“没有奈何中底奈何”。

当时的俞平伯也不过是二十五六岁的光景，已置身“可咒诅的一切”的世界了，因此，他只能暂避于“疯魔似的童年的眷念”的港湾。

这是生逢乱世惟一可行的自我慰解！

俞平老人便很喜欢写梦境，如《梦记》、《我想》等。他的《忆》有这样的两句诗：

小燕子其实也无所爱，
只是沉浸在朦胧而飘忽的夏夜梦里罢了。

小燕子可视为俞平老的自况自喻。

对于他来说，人生是一大梦，如果他不在朦胧的梦中去寻求心灵的慰藉、精神的寄托，他在大半生的政治风暴、巨大的人生逆流中，早已遭到灭顶之灾。

这是无奈何中的奈何！

韦柰兄在本书中曾写到俞平老病重的时候，曾念叨着“给写文章的人”寄钱，而收钱人竟是文学后辈的我，那款款情谊，岂止于一泓的潭水，里边包含着无尽的期待。

每当想起这桩事，便激动不已。

我与俞平老虽是忘年之交，他的道德文章，如高山流水，仰之弥高，是我这个文学小辈一生也难以沾到边的。想到他在视力几乎零的情况下勉力为他家乡学校写的横匾：“业精于勤”，我便为之抖擞精神，没敢躲懒。

1992年11月15日于香港





My Grandfather Yu Ping Bo
我的外祖父俞平伯

楔子

儿时的俞平伯与高祖俞樾合影



我两岁时，随母
亲自广州到北京，从
此40余年与外祖父
生活在一起。在他的
众多孙辈中，惟有我
成长在他身边，我是
幸运的。也许是因为
过于亲近的缘故，所
以每当朋友们要我讲
讲他是怎样一个人的
时候，我往往不知从何
说起，因为在
我的眼里，他实在只
是个普普通通的老人。
一年四季，他打

为韦柰的文字稿修改
的手迹(一)

武康路小庄书屋
序文本应由我来写，无奈近日
体弱多病，难以成句。
乃局
得命外孙韦柰代为
我也参加些意见，并请赐教。
莫修改，权当序文。

对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三联

书店及编辑林乐齐先生所
做的工作，深表谢意。

平伯谨记

着赤脚，几套被烟灰烧得大窟窿小眼的中式布衣裤，破了补，补了再穿，以致使我的母亲，为他1986年赴香港讲学的“行头”大伤脑筋，翻箱倒柜，只找到一件勉强可穿的半新中山装，想为他置新装，却遭拒绝，说：“这就很好嘛！”一身布衣，他登上了飞机。外祖父是个很爱吃的人，但在日常生活中，每日两餐只是做什么吃什么，从不挑剔，烟虽抽得很凶，但却从不理会是什么牌子，好像是只要能冒烟就行。他那套饿了就吃、困了就睡、没有任何清规戒律、被他称之为“大水养鱼法”的生活习惯，使他活得轻松，无拘无束，一点儿也不累。对我们晚辈，他从不训斥，更无长篇大论的说教，自己的事自己了。“文革”中，我们几乎都下了乡，然而后来却没有一





My Grandfather Yu Ping Bo
我的外祖父俞平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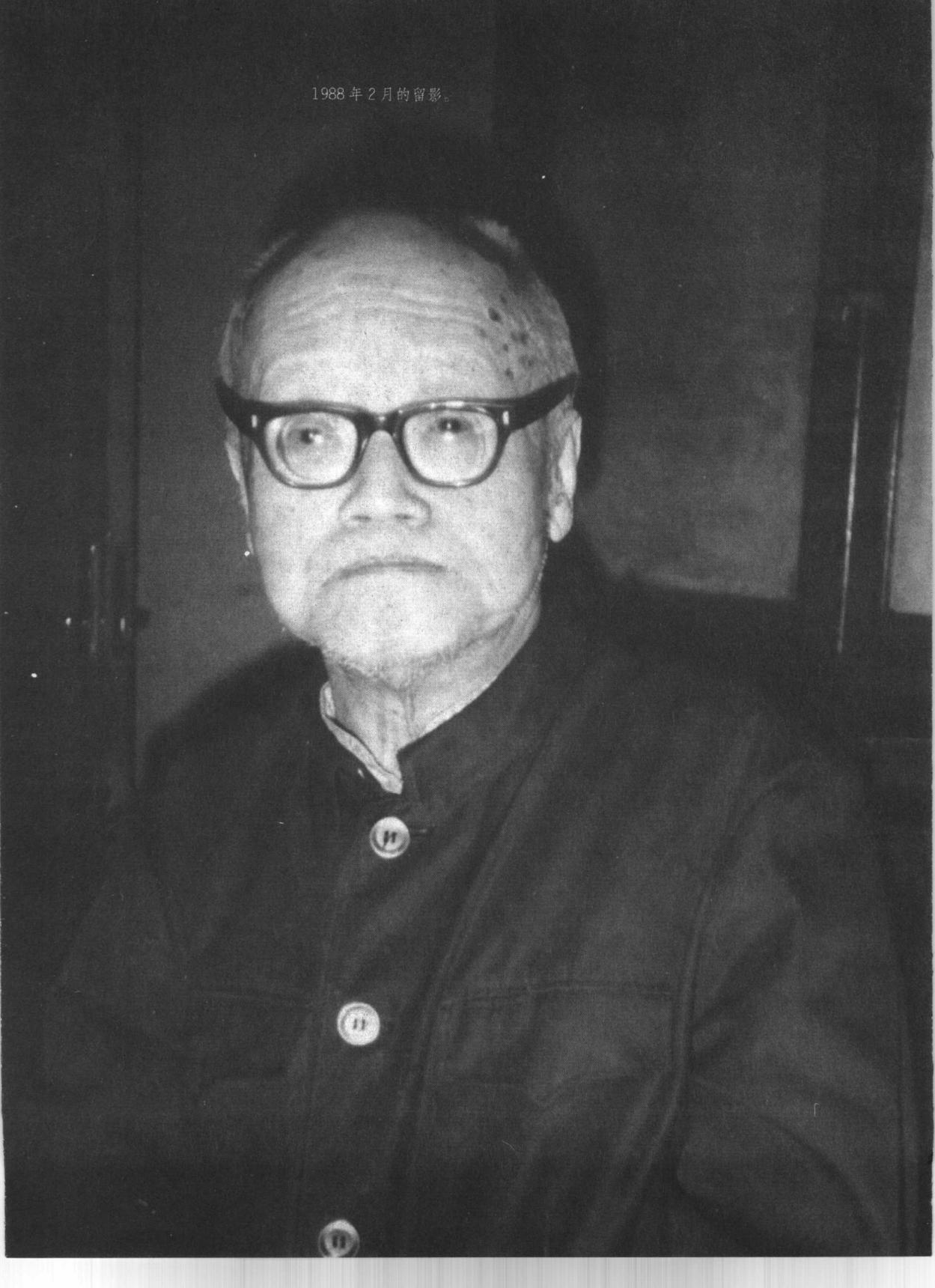
个人是凭借他的“关系”回到北京的。他对我显出极其严肃认真的时刻,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看我的文章,提出修改意见的时候,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允许马虎。文章写得好,他会高兴地夸我几句;不满意时就大笔一划:“改好再拿来看!”在与他共同生活中,惟有此时我才感到紧张。就这样,我追随着他,在不知不觉中受着教育和熏陶。他把点点滴滴的爱,无声地注入我的心头。我长大了,他却老了。尽管在他重病期间,我已有了他将不久于人世的心理准备,但当他真的悄然撒手离去时,一种不可遏止的悲痛,使我难以自拔。现在,我已搬出了曾与他共住的寓所,尽管每日很忙,却总排不掉我对他的思念,特别是此刻,当我提笔写他的时候,那原本是淡淡的往事,竟带着苦涩,浓重地压上我的心头。

1986年11月,应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和香港三联书店之邀,我陪他去香港讲学。那时他虽行动不便,却谈笑风生,对答如流;清晰的头脑,敏捷的思路,很难令人相信他已是86岁的老人。在短短的7天里,掀起了一阵“红学热”,被称之为“俞平伯旋风”的访问,轰动了香港。那时我再也没有料到,4年以后,在度过了90岁生日不久,他的健康却每况愈下,到1990年4月15日,因再度中风,一病不起,在病榻上苦熬了半年。这半年对他来说是相当痛苦的:失去了行动的能力,每日起坐都要靠男佣抱来抱去;但要强的他,仍多次坚持用勉强能抬起的右手自己吃饭。在这段日子里,最让人难过的是他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的迟钝,他想说的,我们听不懂;我们说的,他又反应不过来,很多重要而有价值的话题就这样随他去了。生死不可测,他却有先知,这事至今回想起来,仍像个谜,令人费解。早在他发病前几个月,他忽然拿出一张随笔涂写的字给我们看,那上面写着:“一瞑不复秋,黄昏齐至京。身后事当在亚运会后,安葬。”这明明是说,他将再看不到秋天,而亲友们将在黄昏前后赶来参加他的丧礼。当时我和亲人们看了,并不以为然。哪知在“亚运会”闭幕后的第三天,病情突然恶化,他真的未能看到金色的秋天!1990年10月15日上午,我最后一次帮他刮净胡须。中午时分,他最后望了我一眼,轻



1986年访问香港时为读者签名

1988年2月的留影。



舒一口气，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生前那许多坎坷，许多遗憾，烟云般地散去。我相信，他定是带着那颗永不泯灭的童心步入天国，去寻“西湖的六月十八夜”，“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和“陶然亭的雪”。

曾有人劝我写一部有关外祖父的电视剧，因为他所经历的一切极富戏剧性。然而若翻阅他留下的日记，便会发现，他笔下所记述的一切，竟是那样平淡，仿佛一切苦难，一切欢乐与悲哀，都不是发生在他身上，没有抱怨，更不发牢骚。宽容大度是他的美德。豁达的天性，使他历尽磨难而依然故我。而在我的外祖母去世后，每当深夜，常可听到他一个人在房间里自说自话，有时竟到了狂吼的地步，这曾给常住在我家的张贤亮兄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在贤亮的纪念文章中他写到：“外公平伯公深夜的狂吼，是不是也表现了一点点自己尚余的不平之气与不甘心呢？呜呼！外公，您的不平之气与不甘心只能在地下了。每一个人都不是那么甘心地离开世界的。能做到您这样的俯仰无愧，也足够我们后人追思和仿效的了。”

我相信贤亮的话是对的。在我的外祖父心中，定有不平与不甘心，这或许可从他80岁后所写的两句话中得到佐证：“历历前尘吾倦说，方知四纪阻华年。”他曾加注说：“十二年为一纪。”若从1954年对《红楼梦研究》批判时候算起，他正是华年受阻，到“文化大革命”，则更是不堪回首了。待一切平复之后，他已经老了、倦了，相信他不是无话可说，只是倦说罢了。





My Grandfather Yu Ping Bo

我的外祖父俞平伯

一、倦说《红楼》

1

在我与外祖父共同生活的40年中，从未听他议论过1954年那场对他来说是极不公正的批判。他是个不善言谈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之间的谈话，都是等他高兴时把我叫到卧室谈上几句，或是他走到客厅，大家听他议论一番。我们之间的谈话，没有什么一定的主题，但总括起来是谈诗词、写作多，谈《红楼梦》少；谈天下事多，谈家事、往事少。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是绝口不谈《红楼梦》，显然这是有意回避。所以他若不提《红楼梦》，我们是没那个胆量去碰钉子的。这种状况，直到1986年才略有改变。由于深知他的心境，许多想向他求教“红学”的来访者，大都被我们“挡驾”。被拒之门外的来访者，或许会误以为他过于清高，难以接触，殊不知我们家中有了“禁区”，而这个禁区，轻易无人敢去碰一碰。别看他老人家平日和和气气的，若惹得他不高兴，脸一板，眼睛直直的，也怪吓人的。人们常在他的名字前冠之以“红学家”，但他却从未承认过自己是“红学家”，只说：“我仅是读过《红楼梦》”